

“实践哲学”本土化视野的价值与误导

◎ 樊志辉

【摘要】“实践哲学”被国内许多哲学从业者用来诠释马克思的思想。在实践哲学的本土化过程中，中国现代哲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误导——历史理性主义和天人合一的价值民族主义。要超越这一限制，笔者提出后实践哲学的建构理路，以期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超越维度和批判尺度。

【关键词】实践哲学 本土化 后实践哲学

【作者简介】樊志辉，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1-0013-07

马克思的思想文本进入到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起到了某种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对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文本在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作用及其获得的诠释，

就可发现马克思思想文本在中西方社会中具有不同的表达和历史作用。晚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从业者，把马克思哲学思想诠释为“实践哲学”，力图以实践为根基来统摄对马克思思想文本的总

形而上学或本体论；

（4）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形而上学与逻辑的联系，只是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两者并无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是否与逻辑相联系，并不是判断有无形而上学的标准。

①《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宋继杰编，上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97页。

②英文译文见G. S. Kirk等编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2nd. ed., Cambridge, 1983。

③④柏拉图：《理想国》，477a-479e、479b。

⑤《智者篇》，237a。

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185b25。

⑦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30b 5。

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32b 1-15。

⑨⑩《纯粹理性批判》，A598、B626-A599、B627；A599、B627。

⑪The Meditations and Selections from the Principles of Rene Descartes, trans. by J. Veitch, Open Court, La Salle, 1948, pp. 156.

⑫参阅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

⑬Thomas Aquinas, On Spiritual Creatures, trans. by M. G. Fitzpatrick, Milwaukee, 1949, pp. 52-53.

⑭Kierkegaard, The Point of View, trans. by W. Lowrie, London, 1939, p. 88.

⑮Heidegger,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Logic, Indiana, 1984, pp. 100-101.

责任编辑：罗 苹

体性把握。面对近期思想界重返马克思文本的趋势,我们有必要审慎地审视汉语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释的本土化视野的价值与缺失。

一、经典实践哲学的精神维度

1.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我们这里所指的实践哲学,并不一个普泛的实践哲学,不是一个欧洲哲学传统中与“理论哲学”相对应的“实践哲学”,而是特指由马克思的思想文本所开启的以“实践”作为理解世界基石的哲学运动。在学术界人们常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形成了作为马克思思想文本的经典实践哲学,也即实践哲学的理论形态,和“应用的实践哲学”(也即实践哲学的本土化形态)。

2.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其精神旨趣必须落实在西方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才能把握。现代化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其精神核心在于世界的社会体制与精神秩序开始逐步摆脱教会和教义而走向自主的生成过程。这一现代化的现实层面则是所谓的工业化,但工业化并不是现代化的核心,现代化之所以为现代化的“现代性”在于如马克思·舍勒所指出那样为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具体地说就是以主体性的现实人,即以身体活动为基元的人颠覆传统的宗教——形而上学的人。宗教——形而上学的坍塌,所导致的乃是建立在宗教——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的失序,因而现代化又具体地体现为在丧失形上原则的情形下如何安顿社会秩序与个体心灵秩序的问题。欧洲宗教改革以后的各种思潮的演进都应当在这一脉络下得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在此也不例外,不可把马克思的思想单纯地理解为一种哲学或社会改造的思想(尽管是所谓伟大的思想),而应当理解为欧洲社会有机体所滋生的一种独特的现代化方案。

3. 在欧洲各种“现代性”的哲学思潮中,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推到了极端。近代哲学始于唯名论的兴盛,由此哲学由形上学存有论向以主体为基

础的知识论演变。于是哲学的自明性根基,不是古希腊的存有和中古的信仰,而是主体本身。对主体的把握,经历了从“我思”、“我意”(我欲)到“我行”的转变。实践哲学以“实践”为根基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形上学,取消了传统所谓“知识”的“自本自根”性,于是传统所谓的知识真理,就成为了依附于特定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任何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建立在内在于社会历史中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全部的社会意识真理仅仅在于它在何种程度体现了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安顿和人心秩序的整合也必然是建立于基于社会实践的所谓历史必然性上。对马克思所身处的历史时代而言,“实践哲学”所着力要表明的是社会历史的真正方向只有在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中才能得以展现,因而现代社会秩序及人心秩序安顿的合法根据不在第三等级所高扬的“资产阶级法权”,而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4. 需要指出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社会意识,而是与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相应的集体意识。这样的阶级意识不会自动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之中产生,而是来源于工人阶级的导师和领袖的阐释与灌输。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运动据说就是在此意识的导引下得以实行的。

5. 经典实践哲学的理论宗旨在于以实践为根基颠覆一切与实践的历史运动趋势相违背的伪价值(即意识形态),在现实实践上则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核心实现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并由此完成全人类的解放。

6. 至此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本主义思潮被推向了极端,主体意识获得极度的膨胀。这是一个在韦伯看来世界“祛魅化”的过程,马克思则以为这是彼岸世界的真理丧失以后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的时候。而此岸世界真理建立的基石则是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历史实践。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就是在此意义上提出的。同时对经典实践哲学来说,实践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作为认识论的基石,而在于实践是人类历史一切问题的生长点和

解决问题的钥匙。

7. 如此马克思就将欧洲传统社会的人——神二元张力的神义论转变为人本主义的实践一元论的人义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马克思而言,如此的实践一元论的人义论,依然是以欧洲传统的人——神的二元张力为背景的。这即是说马克思把思想的重心放在此岸,强调思想的现实性建立在此岸的实践上,但真正的自由依然在彼岸。彼岸世界是此岸世界的方向,但又是建立在此岸世界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①在马克思那里,超验的彼岸自由和现实的实践活动(劳动)之间就存在着必要的张力,由此实践一元论的人义论就是以隐性的超验追求为宗旨的。离开这个隐性的超验维度,马克思的思想就会被曲解为经济决定论(如许多马克思思想的后继者那样)或历史理性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如卡尔·波普所理解的那样)。如何恰切地把握马克思思想中的超验维度和现实实践维度的问题,目前依然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二、“实践哲学”的本土化视野

1. “实践哲学”的本土化,意味着马克思的

经典实践哲学从其欧洲文化语境中移植到像中国这样“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对中国而言,“现代化”不是本土文化和社会有机体自身的产物,而是在“资本国际化”过程中的无奈选择。当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两次运用本土的文化资源谋求现代化的努力失败以后,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思想资源就转移到西欧的思想文化之中去了。如此欧洲现代化的主要方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其思想渊源——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要精神资源,成为现代中国建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根据的精神资源。

2. 马克思的以实践哲学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是直接针对资本主义制度而发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法理意义上的自由诉求,在其现实性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现实利益的法理表现,在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作为生产力代表的第四等级——无产阶级在现实上恰恰丧失了自己的法权利益。只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建立在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基础上,才会出现一个平等的社会。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本土化,丧失或者是转换了它在欧洲语境的社会批判功能,演变为社会建构功能。这一建构功能现实地体现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它包含建设民族国家和建构现代国家两个方面。

3. 实践哲学的“实践性”不仅当今学院派实践哲学家所阐释的那样:利用实践去解释意识的发生和人类历史的矛盾发展,而且更体现在实践哲学自身就是“实践”的。这意味着“实践哲学”不是一般的对世界加以总体性说明的知性哲学,而是直接以变换或改造世界的现存状态为使命的哲学。对马克思来说,“实践哲学”乃是基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行动纲领。在中国,这一行动纲领突出地表现在它的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不同于它在欧洲所依赖的新兴产业工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实践性”在中国所依赖的是新型知识人和农民。

4. “实践哲学”在中国的知识人与农民的视野之中,发生了语境和处境的转换。马克思实践

哲学在欧洲语境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被置换为对以资本主义自由理念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方案的拒斥（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建立其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近百年来饱受资本主义欺凌的中华帝国，丧失了它千年的历史荣光。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之中，社会主义就不仅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理念，也是像中国这样在国际竞争中的弱势国家的翻身理念。相对于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来说，以实践哲学为根基的共产主义理念不仅具有自由主义所没有的社会动员力量，也因它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理念的批判，成为“五四”以后丧失民族文化合法资源的现代中国的新的民族文化语符；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置换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精神支撑，成为中国赶超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根据。

5. 这样一来，马克思的经典实践哲学，在中国的现代化国家建构中通过政党理念逐步地转变为国家理念，成为了本土化的实践哲学。这个本土化的实践哲学和经典实践哲学的差异，一方面在于所谓的中国特色，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在于在这二者之间发生了价值位移。以欧洲传统的此岸与彼岸二元张力为背景的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一元化的实践哲学，在现代汉语文化语境下成为完全关注此岸世界的为建构民族国家提供精神资源的一元化的实践哲学。这并不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不具有批判精神，而是说它的批判精神在现代中国缺失了具体的目标指向，而成为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拒斥和现实的政治动员方式。当中国本土的实践哲学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后，它的以平等理念为诉求的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就日益突显出来。

6.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人来说，“实践哲学”及其所引导的社会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可以取代传统儒学以重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对中国的民众（主要是农民）而言，实践哲学是他们的翻身理念，可以使他们恢复日常生活的安宁。因而在实践哲学的本土化过程之中，传统儒家文化的世俗主义精神取向，就成为对实践哲学诠释的前在视野。

7. 近20年中国学院派的实践哲学，在对马

克思的实践哲学文本的诠释中，力图消解讲坛哲学的教条主义性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现实性。并通过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理想主义的向经验主义的过渡。学院派实践哲学的建构方向虽然和讲坛哲学有所不同，但它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总体转变是一致的。即都是谋求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元化的世俗主义诠释。只不过这种世俗主义的基点由政治民族主义转向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②

8. 马克思经典实践哲学的本土化，不仅在理论上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思想格局，也在现实上塑造了现代中国的生存样态。以实践哲学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为中国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的再次建构提供了一套崭新的价值理念，从而满足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在由西方涌入现代中国的各种意识形态之中，马克思主义比其他主义意识形态都更符合中国的现实需求。如此的说法并不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而作的现实辩护，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理论更为符合中国现代的历史任务：反封建、反帝。反封建，体现现代中国的民主主义的要求，是文艺复兴以后一切现代理论的共同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反封建的强有力的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期能够和自由主义者结成思想上的统一战线的原因。反帝，是中国这样在国际资本竞争中处于弱势的民族国家的特殊要求，反映了弱势国家的民族平等要求。虽然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一种现代化理论，但由于它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使它难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理念要求（尽管许多自由主义者在内心深处也是民族主义者）。而现代中国的其他一些思想流派也具有反帝的特征，却无法担当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如战国策派、论衡派等。而以实践哲学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比其他主义更具广泛的社会动员力，成为真正可以“掌握群众”的理论武器，

而不是象牙塔的理论抽象。

9. 实践哲学的本土化,对现代中国来说,已超越一般的理论问题,成为了中国的直接现实问题。它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格局和制度建设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和转折。在这一历程中,中国传统的宗法体制被颠覆,儒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不复存在。中国开始步入现代国家的行列,并在以实践哲学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理念基础上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的特有形态。这是实践哲学本土化所特有的价值。在这一本土化过程中,中华民族又重新找回了它曾经具有又一度丧失的民族自豪感。

三、后实践哲学:对实践哲学及其本土化视野的超验批判与奠基

1. 然而这个本土化亦是需要加以检讨的。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实践哲学的本土化视野的问题。我们需要恰切把握实践哲学在本土化的诠释过程中,保持了什么和失去了什么?实践哲学的精神旨趣在本土化过程中是否发生了转换?假如发生了转换,对现代中国哲学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加以深入分析的。主要从哲学理念层面和知识社会学层面入手分析。

2. 在哲学理念层面,实践哲学的本土化,逐步失去了马克思的经典实践哲学在欧洲语境的此岸——彼岸的二元化张力的隐性背景,转变为汉语言文化语境的此岸与彼岸的彻底合一的世俗主义一元化。马克思虽然把自己的任务定位在彼岸真理消失后如何确立此岸真理的问题,但在他那里此岸与彼岸的张力依然保存,并没有演变为彼岸一元论的唯实践论的人本主义。对欧洲文化语境来说,彻底失去彼岸观照的世俗化的结果是虚无主义的来临,从尼采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说明了“上帝死了”以后虚无主义对人精神生命的侵蚀。以“实践哲学”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是将超验与经验统摄于人的现实革命中的实践哲学,是以超验维度批判和引导人的经验幅度的实践哲学。而本土化的实践哲学,特别是近年来的学院派实践哲学,以中国传统儒家天人合一的世俗主义去诠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这在理论

上是取消马克思思想中的内在张力。失去了这一内在张力,必然丧失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蕴含的批判精神,将自我批判的功能萎缩为自我论证和辩护的功能。传统儒家天人合一的传统渗透到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诠释,导致对现实的圣化,即将世俗权力神圣化的趋势,致使各种伪价值泛滥。而当这种神圣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失去了现实运作机制时,又不可避免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将神圣世俗化,其现实表现就是拒绝崇高、无所信仰的价值虚无主义。

3. 在知识社会学层面,实践哲学的体制化,导致对实践哲学的诠释成为一种权利的垄断,并和现代科举制结合在一起,以此置换传统儒家在社会文化体制中的地位。这一局面的直接现实结果,就是实践哲学的“教科书化”。由此,马克思的经典“实践哲学”在本土化过程,“哲学性”转化为意识形态的自我论证和教条主义的僵化形态,“实践性”演变为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和官僚主义的“运动群众”。而这一切的潜在心理支撑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专制主义梦魇和华夏中心主义的梦想。马克思富有生命力的实践哲学在现实中的意识形态垄断,必然导致现实社会的停滞和僵化。“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可仅仅看作执政党历史经验的不足和所谓封建遗毒所致,其中实践哲学本土化的误导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4. 如何克服实践哲学本土化中出现的价值偏失,自然就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近20年来中国哲学界的精神取向,无不与此相关。邓小平理论的提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取向开始由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过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将不可避免地转换实践哲学理论的社会运作机制,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理论具备自我超越的社会学基础。与此相应,中国学院派的实践哲学家也开始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诠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力图以此突破僵化的讲坛哲学的限制。必须承认学院派实践哲学在现代中国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有着巨大的推动,并使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理论与现实的实践直接关联起来,以

实践一元论取代传统的物质一元论，并以此作为诠释马克思哲学的基点。如此的诠释，的确领悟到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层面——实践，却丧失了马克思哲学中的超验维度。而当代中国的学院派实践哲学家们却以化解超验与经验的二元张力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核心精神，却不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恰恰是建立在此二元张力基础上的。他们只顾去考察实践对哲学和社会生活的奠基作用，却忽视了“实践是如何可能的”这一更为基础的问题。他们恰恰忘记离开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超验幅度，所谓对实践的认识论、本体论、生存论、人类学等方面的透视，只解决了实践在实然层面的历史演进，而无法切实地说明对人而言什么样的实践才是真正属人的实践而非一般的活动。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价值指向的根据，是否蕴含在人类实践自身之中？如果是，则实践自身成为实践的判准，实践的合法性也就是实践自己。

5.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根基不仅仅是“实践”，作为实践前提的则是个体意志的自由和超越的情怀。否则马克思就不会说自由王国在必然王国的彼岸，也没必要奢谈什么人类的解放和救赎。如果离开这个超验幅度，就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混同于现代的价值虚无主义及其后现代主义思潮。

6. 因此，我认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要突破实践哲学本土化的困境，就必须超越所谓一元化的实践范式，进入“实践哲学之后”的时代。“后实践哲学”的立场将是“实践哲学之后的时代”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姿态，并不是刻意与“实践哲学”相对抗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或哲学运动，只是“实践哲学”之“后”的一种哲学探索的精神姿态。“后实践哲学”之“后”不单纯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超越论的概念。这个“后”就是超越。“后实践哲学”所要表达是基于“实践哲学”所造就的历史文化及生存景观寻求一种新的精神转向，实现对精神活动的超越奠基，和哲学言说语式的转换。“后实践哲学”的一个基本努力方向就是要重新探求精神活动的绝对根基，恢复精神活动的自主性根基，消解“实

践哲学”中的“实践”本体化倾向，重新审视传统形上学的价值。借助于对超越基点的探寻，实现对现实实践的超越审视，以避免价值的虚无化和虚假化。简言之就是要实现形上学的重建，完成与实践相统一（而非同一）的超越形上学，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心性之学和文化哲学。

7. “后实践哲学”探求如何为个体精神确立超越性奠基，并实现哲学言说方式的改变。“后实践哲学”所要追问的是：人类的精神活动是否可以完全规约于实践活动之中？人的个体精神即位格（*persona*）固然不离人的肉身及其活动（实践），但是否因此可以认为个体精神不具有某种生存论的优先性？因此所谓的“后实践哲学”乃是“实践哲学”的自我超越与自我发展。在“实践哲学”的经典作家那里，个体价值与超验价值维度，虽然在哲学的文本结构中，不占有突出地位，却构成其思想的隐性线索，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自明的前提，因而他们的哲学论述自然就不将重点放在对超验价值与个体位格的阐发，而是落在如何建立一种社会机制，以确保个体价值的真实实现。如果说与整个世界性的世俗化浪潮相适应，以“实践哲学”来诠释或总括马克思的思想文本具有某种社会历史价值的话，那么在面临价值虚无主义威胁日益严重的今天，重新发掘马克思思想文本中的有关超验价值和个体位格的精神主旨，建构以马克思思想文本为主要精神资源的“后实践哲学”，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后实践哲学”将首先寻求确立的是“超越的心性哲学”，并通过“心性哲学”和经过限制的“实践哲学”的互动或整合来谋求文化哲学及其相应的实证社会科学的确立。即“后实践哲学”将拾起或重建被世俗化、一元化诠释的“实践哲学”所否定或遗忘的形上学存有论。“后实践哲学”所欲建立的不是解构性哲学，而是奠基性的哲学，是谋求形上学存有论的重建。它力图使在马克思思想文本中呈“隐态”的，而又被此后的“实践哲学”所淡忘的“心性语言”和“超越意识”，变为“显态”的“超越哲学”。借此扭转和弥补“实践哲学”重建中所表现的超越维度的缺失，进而完成马克思思想中实践维度与超验维度的整合，

重新恢复马克思思想中的此岸与彼岸、经验与超验的二元张力。

8. 从后实践哲学的立场出发,我们就可以超越实践哲学本土化视野中的误区。这是因为只有从超验的维度出发,才可以摆脱价值问题上的民族主义立场,进而明了价值的坚实根基并不奠基在所谓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我们的思想家们到今天尚没有明白:个体价值与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历史实践的关联性。个体价值植根于它所身处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在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得以展现。但这并不意味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对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体具有价值的优位性。从现实历史的实践活动出发,可以真切把握个体价值与人的实践获得现实关联和历史关联,却无法决定具体个体的价值定向性。具体个体的价值定向依赖于或奠基于个体的超验的价值情怀,是超验的情怀使个体超越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和实践的必然性。我们承认现实实践和历史文化传统是个体价值实现的现实起点,但并不必然地决定个体价值的方向。马克思思想的价值不在于否定了犹太教——基督教的基于超验维度的价值关怀,而在于他将这一价值关怀从价值心理意向落实和统摄于现实的历史实践之中。如此古希腊的预成论传统和希伯莱的末世论传统获得现实的统一,在这里的“统一”不是“同一”,它表明超验的价值关怀和现实经验的历史实践之间存在不可消解的二元张力。唯有这个超验的价值关怀,才可超越于具体的历史文化处境,超越于一切虚幻的民族主义(包括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或价值民族主义)、超越于自我圣化的阶级意识。同时也只有通过现实的历史实践才可以将超验的价值情怀落实于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落实于现实的民族解放、落实于特定的阶级意识之

中。

9. 从后实践哲学的立场出发,现代中国哲学将可以超越实践哲学本土化视野中民族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限制。我们承认并且认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构,即民族自救和国家的现代化,是现代中国思想界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单纯在民族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结构中得到解决,而需要对此二者加以超越的超验幅度。只有在这一超验幅度之内,中国传统儒家天人合一的精神架构才可以超越,才可以避免对现实世界的圣化以保持马克思主义在超验关怀下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确立马克思思想的超验幅度,才可以避免马克思的思想资源被部分知识人乃至意识形态所垄断,使马克思思想对群众的掌握建立在自由个体认信的基础上。如此二元张力的恢复与确立,不仅使马克思思想理念的结构更为完整,也将使马克思思想的社会运行机制更为健康,进而摆脱和超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传统儒家思想来看待的社会运行方式。在我看来,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再诠释和重建马克思思想的社会运行机制,实践哲学本土化视野中的误导将被超越,中国走向现代化历程中出现的价值伦理亏空将得到扭转。从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可以获得更为广阔思想和现实的空间,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别有一番天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②参见拙作《实践哲学的域限及对实践的自明性的质疑——后实践哲学论纲(一)》,《求是学刊》2000年第3期;《对中国学院派实践哲学的反省与超越——后实践哲学论纲(二)》,《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

责任编辑:罗 苹